

挽救中国

邓小平经济思想研究

张恒云 洪顺腾 乔歧刚 著

陕西人民教

挽救中国

——邓小平经济思想研究

张恒云 洪顺腾 乔歧刚 著

(陕)新登字004号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西安长安南路吴家坟)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彩印厂印刷

850mm×1168毫米 32开本 10.125印张 263千字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419-5175-7/G-4456

定价 5.90元

当中国任人宰割、任人欺凌的时候，当中国人被视为一盘沙、东亚病夫的时候，邓小平和他的同志们领导了挽救中国的艰苦卓绝的人民革命运动，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的—页。

当中国人民在“三面红旗”、“反右倾”之后，贫病交加、饥寒交迫的时候，邓小平试图以“猫论”来把人们从灾祸中挽救出来。

当中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喧闹声中，面临经济崩溃边缘的时候，邓小平冒着极大的风险，不顾个人安危，力图通过“全面整顿”来挽救中国。

当人们在“两个凡是”和“按既定方针办”的束缚下奋力搏斗的时候，邓小平毅然站出来，领导和推动了“真理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大讨论，领导和推动了改革开放，实现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实现了战略重点的转移，实现了党的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

当有人“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用“姓社姓资”吓唬人的时候，邓小平南巡，发表了振聋发聩的谈话，扭转了局势，推动了改革开放，被人们誉为第二次思想大解放。

目 录

序 篇 历史追求性格贡献

第一章 历史	(1)
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1)
批判的人口和人口的批判	(5)
接连不断的政治地震	(7)
不应否定的经济理论	(10)
不应否定的人	(24)
第二章 追求	(29)
不革命的“革命口号”	(29)
革命的“反革命理论”	(31)
“三项指示为纲”的苦衷	(34)
第三章 性格	(38)
“维吾尔族的姑娘”	(38)
不完全清醒	(40)
毛泽东做的和没有做的	(43)
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45)
第四章 贡献	(47)
思想僵化就要亡党亡国	(49)
解放思想无止境，要敢于冒风险	(53)
“我是实事求是派”	(54)
扭住不放的“顽固”派	(61)

第一篇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第五章 生产力的地位	(66)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66)
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	(69)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71)
“我是改革派”.....	(74)
第六章 根本标准	(85)
衡量社会制度优劣的根本标准.....	(88)
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根本标准.....	(92)
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	(97)
检验一切工作好坏的根本标准.....	(102)
第七章 第一生产力	(104)
科学技术和生产力.....	(104)
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109)
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112)
基础在教育.....	(119)
第八章 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	(127)
实现温饱.....	(127)
奔向小康.....	(131)
中等水平.....	(134)

第二篇 经济成分

第九章 多种经济成分	(138)
被扭曲了的规律.....	(138)
被歪曲的社会.....	(142)
第十章 以公有制为主体	(144)
不全的全民.....	(144)

老包进城·····	(146)
让企业返回市场·····	(149)
名不符实的集体·····	(151)
褒贬“三资”·····	(154)

第三篇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第十一章 计划经济 ·····	(157)
始作俑者·····	(157)
充分肯定者·····	(158)
提出修正者·····	(160)
变形实践者·····	(162)
模仿实践者·····	(164)
实践的挑战·····	(165)
彻底否定者·····	(166)
第十二章 市场经济 ·····	(174)
“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	(174)
“安全的市场经济”·····	(177)
“有国家无政府”·····	(180)
第十三章 乌托邦之破灭 ·····	(184)
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	(184)
大溃退·····	(197)
第十四章 胜负之谜 ·····	(200)
是调动还是压抑劳动者的积极性·····	(201)
是发挥还是束缚企业的活力·····	(212)
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	(218)
是科学分析还是主观臆造·····	(222)
第十五章 姓别学 ·····	(227)
有“姓”的和无“姓”的·····	(229)

不只两家·····	(229)
“姓别”和好坏·····	(232)
判断的标准·····	(234)
姓别学何以泛滥·····	(236)
第十六章 谁之过 ·····	(240)
“热”的冷思考·····	(240)
渎职病的痛思考·····	(246)
“世风日下”的反思·····	(249)
冷的热思考·····	(256)
“车匪路霸”的深思考·····	(261)

第四篇 向世界开放

第十七章 吃过这个苦头 ·····	(264)
从开放到封闭，从强盛到衰弱·····	(264)
谁的月亮圆·····	(268)
垄断自己的垄断·····	(273)
第十八章 不开放不行 ·····	(278)
不让人家进来不行·····	(279)
不打出去不行·····	(284)
不全面开放不行·····	(287)
不长期开放不行·····	(292)
第十九章 影响不了 ·····	(294)
空气和苍蝇·····	(294)
主体和补充·····	(298)
大头和小头·····	(302)
基础和辅助·····	(304)
继承和发展·····	(308)

序 篇 历史追求性格贡献

第一章 历史

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形成，是以一定的历史为条件的，特别是以中国特定的历史为条件的。我们曾经有过光辉的历史，也曾有过丑恶的历史；我们曾经夺取了伟大的胜利，也曾犯过“史无前例”的错误。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形成了具有显著中国特色的邓小平经济思想。下面，我们试图分析这种历史。

一、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我国经济的发展，从1949年到1976年，大体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1949—1956年为第一阶段，1957—1976年为第二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呈现速度由快而慢、效益由高而低、时起时伏的特点。到后期，则濒临崩溃的边缘。

从国民收入的增长看，第一阶段从1949年的358亿元增长到862.3亿元（按1952年的不变价格计算。下同），7年增长了1.48倍，年均增长率13%；人均国民收入从1949年的66.1元增长到141.1元，增长了1.13倍。第二阶段，国民收入增长到2205.8亿元，20年增长了1.56倍，年均增长率只有5.2%；人均国民收入增长到234.3元，20年只增长了66%。如果这20年按前7年的速度增长，1976年的国民收入就不是2205.8亿元，而是9595亿元，是1949年的26.8倍，是1956年的11.1倍；人均是1023.7元，是1949年的15.5倍、1956年的7.2倍；后20年累计国民收入就不是28314亿元，而是77174亿元，20年累计少收入48860亿元，相当于1949年的136.5倍，1956年的56.7倍。为什么前7年的经济发展很快、

而后20年的发展又这么慢呢？这种强烈的反差，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

这后20年的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不但十分缓慢，而且发展很不稳定。按不变价格计算，1960—1965年连续6年的国民收入低于1959年，其中最低的1962年只有771亿元，比1956年的862.3亿元还少近90亿元；1967、1968两年又低于1966年，其中1968年为1179.8亿元，比1966年的1360.6亿元减少181亿元多；1976年为2105.1亿元，比1975年的2265.9亿元减少160多亿元。就是说，在这20年间，有9年低于历史最高水平；其中负增长的年份是1960、1961、1962、1967、1968和1976年，分别比上年下降1.44%、39.68%、6.50%、7.23%、6.53%和2.65%。我国经济发展的这种波动频率、持续时间和波动幅度，甚至超过了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美国在战后发生的1957—1958、1960—1961、1969—1970、1973—1975年的四次经济危机，最长的持续时间只有三年，危机期间工业生产下降的幅度最高的一次为14.8%，其他三次均在10%以内。而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在同期内有5次下降，其中1961年为31%，1962年为10.12%，1967年为9.6%。从理论上讲，资本主义经济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发展的，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发展的，不可能发生结构失调和大的经济波动。但是，客观现实又是相反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波动次数、波动幅度和持续时间又比社会主义的中国少、小和短！这同样会引起人们的思考。

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指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这里说的“比较”，也就是思考；这里说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优谁劣的问题。老百姓是最注重实际的。你把社会主义吹得再好再妙，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老百姓也不会相信。

过去几十年，我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确实比我国发展得快。

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1950年大约为165亿美元左右，人均大约30美元左右。1991年19855亿元，按1978年的不变价格计算为10552亿元，按1980年1：1.58的汇率计算合6678.5亿美元，41年增长了39.5倍；人均577美元，增长了18倍左右。（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我国1991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30美元，这是不准确的，因为它既没有考虑汇率的变化，也没有考虑我国物价的变化，而是直接把以现价人民币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除以现行汇率。当然，我的计算方法也不准确，因为没有考虑1978年以前的汇率和物价的变化，但这总比世界银行的计算方法更接近实际）这个发展速度，同世界大多数国家相比，是比较快的，但同一些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又显得慢了。

例如日本。1950年国民生产总值180亿美元左右，同我国差不多；人均217美元左右，是我国的3倍。到1991年它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7308亿美元，增长了150倍多，是我国的4倍多；人均23570美元，增长了107倍多，是我国的41倍。

例如韩国。1962年国民生产总值11.6亿美元，人均83美元，人均水平同我国差不多。1991年达到2808亿美元，29年增长了140倍多；人均6498美元，增长了78倍多，是我国的近12倍。

例如新加坡。1965年国民生产总值9亿多美元，人均481美元，是我国当时人均水平的6倍左右。1990年增长到360亿美元，25年增长了38倍多；人均13636美元，是我国的近24倍。

例如台湾。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46年为50美元，是当时大陆水平的两倍左右。1991年为8815美元，45年增长了175倍多，是大陆的近16倍。它1991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810亿美元，相当于大陆的27.4%，而它的人口只占大陆人口的不足1.8%。现在台湾居民家庭财产平均为28万美元，也比大陆居民家庭平均水

平高得多。

例如香港。1950年国民生产总值6亿多美元，人均210美元，是当时大陆人均水平的7倍。1991年增长到606亿美元，增长了100倍；人均10433美元，增长了近49倍，是大陆的18倍多。

近20年来，泰国的发展速度也比我们快。1970年它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95亿美元，人均258美元，略高于我国的人均水平。1991年增长到815亿美元，增长了近8倍；人均增长到1443美元，增长了近5倍，是我国人均水平的2.5倍。

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建国以后，特别是1957年以后，如果我们建立合理的政治经济体制，从而不犯那一系列主观指导上的错误，即使底子差一些，经济发展速度和社会精神面貌也不会比它们差多少。当然，它们的发展也有它们各自特殊的条件，是不能进行机械类比的。但如果热衷于以“条件特殊”辩解，自甘落后，也是极不明智的。

从财政收入上看，从1950年的65.2亿元增长到1956年的270.2亿元，6年增长了3.13倍，年均增长率为27%；1976年增长到776.6亿元，20年只增长了1.7倍，年均增长率只有4.8%。这20年财政收入的增长也是很很不稳定的；有7年是低速增长或负增长：1961年为-37.8%，1962年为-11.9%，1967年为-24.9%，1968年为-13.8%，1972年为2.94%，1974年为-3.3%，1976年为-4.8%。如果这20年以前6年的一半多（15%）增长，到1976年就不是776.6亿元，而是2578.4亿元；20年累计财政收入就不是10867.4亿元，而是21555.1亿元，20年少收入累计10678.7亿元，相当于1950年的162.8倍，1956年的39.5倍。

从人民消费水平上看，按可比价格计算，全国人均消费水平从1952年的76元增长到1956年的87.4元，4年增长了15%，年均增长率为3.5%；1957—1976年从87.4元增长到126.8元，20年只增长了45%，年均增长率只有1.9%。如果后20年按前4年的速

度增长，到1976年人均应为175.9元，按当年价格计算则为223.4元。这20年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很很不顺利的，有7年为低速增长或负增长：1958年为1.3%，1959年为-12.3%，1960年为-6.7%，1961年为-6.2%，1968年为-5.1%，1971年为1.6%，1974年为-0.2%。而且还应看到，有些年份虽然同上年相比增长较快，但并没有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因而只是恢复性的，这样的年份有5个。所以真正增长的年份只有8年。这种情况也存在于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中。

从独立核算的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上看，也呈现滑坡和波动的趋势。上交利税总额，从1961年到1976年的16年间，有8年是低速增长或负增长：1961年为-64.7%，1962年为-7.3%，1967年为-31.7%，1968年为-15.2%，1971年为4.56%，1972年为3.77%，1974年为-9.7%，1976年为-8.1%；资金利税率，1960年以前维持在30%以上，1961年为15.9%，1967年为17.3%，1976年19.3%；产值利税率，1960年以前逐年提高，达到30%以上，1967年为19.8%，1976年21.3%。

从对外贸易上看也是这样，进出口贸易总额，1950年41.5亿元，1956年增加到108.7亿元，6年增长了1.62倍；1976年增长到264.1亿元，20年只增长了1.43倍，如果后20年按照前6年的速度增长，到1976年应为1200亿元以上，而这个数字是在1984年才实现的，耽误了8年的时间！

二、批判的人口和人口的批判

在这个时期，我国人口再生生产发生了三次重大失误，造成了严重后果。

第一次是1950—1957年。我国人口再生生产迅速从高——高——低类型转为高——低——高类型。在这之前的1848—1948年，我国人口因为受战乱、饥荒、瘟疫等影响，增长极为缓慢，在100年时间内增长了一个亿。建国后，由于实现了社会和生活安

定，医疗卫生有了明显改善，出生率提高到30%以上，其中有5年在37%以上；死亡率从1949年的20%逐年下降，1957年为10.8%；自然增长率从1951年起维持在20%以上，1957年为23.23%；总人口从5.42亿增加到6.47亿，仅用8年时间就增加了1亿多人口。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新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又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忧虑。马寅初先生就是他们的代表。他认为如不及早采取科学的人口政策，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会面临灾难性的后果。不幸的是，中国有一批专营批判人口论的人口，他们把这个理论视为歪门邪道，把马先生视为马尔萨斯的同类，对他和他的所谓“新马尔萨斯人口论”进行了粗暴地“批判”，使我国的人口理论陷入唯心论的泥潭之中，十几年不能自拔！

第二次是1958—1961年。我国人口再生产在一年之间由高—低—高转入低—高—低。这是一次货真价实的人祸，是我国人民空前的大灾难：出生率由1957年的34.03%下降为1960年的18.02%，死亡率由1957年的10.8%提高到1960年的25.43%！在这之前的8年，我国人口每年净增长分别为19%、20%、20%、23%、25%、20%、22%和29%，呈现逐年提高的趋势。但在第二阶段的4年间，净增长率分别降为21%、18%、—15%和—5%，1962年底人口只比1959年多88万。在这四年内，比正常年份多死亡1500多万，1960年就达近1000万！造成这种灾难的直接原因是这期间的“四大”，即“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和为这“三大”开路的“大批判”（“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实质是“大批判”），它造成了大饥荒、大瘟疫、大死亡。

第三次是1962—1971年。人口再生产呈现比第一次更加严重的高—低—高特征。出生率保持在30%以上，其中有4年超过37%；死亡率从1961年的14.24%逐步下降到1971年的7.32%；自

然增长率除1971年外保持在25%以上，其中有5年超过27%；总人口从1962年的6.58亿多增加到8.52亿多，10年时间增加了近2亿。如果不是后来采取了措施，仍然按照这个速度增长，到1981将达到11.06亿，1991年将达到14.35亿！这将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是很难想象的。但是，人们还不愿承认这个事实。1955年、1965年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经常受到的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教育。当时，人们虔诚地接受这种教育，很少想到或不敢想到它是不合理、不科学的：工人阶级比贫下中农还要先进，为什么不让知识青年去接受他们的“再教育”？在农村可以大有作为，为什么在城镇不能大有作为？这是一种面对人口过多而又不愿承认的、转移人们视线的理论。但是，现实是不为“理论”所左右的。城镇人口多，农村人口也多。一方面城里人不愿走，另一方面是农村人不欢迎城里人来（那些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送迎场面，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背景下，是不难安排的）。但是，人口的批判仍然最终迫使最高领导人在1971年作出了“人口非控制不行”的结论，不得不采取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并由此引发出一系列社会问题，而这本来是可以避免、至少是可以大大减少的。

三、接连不断的政治地震

在这个时期，我国社会也陷入日益动荡、人心紊乱的状态之中，形成了人人自危、互相“斗争”的“斗争哲学”。

这种状态可以追溯到1955年的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发批判。胡风等人基本上是文化艺术界的一些名人。在革命过程中，文艺界形成了若干派别。它们的矛盾，同党内的和社会的矛盾既相联系又相区别，除了同投靠日伪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文人的矛盾外，矛盾性质是党内和人民内部不同认识的矛盾。但有人把这种矛盾无限上纲，先是说胡风等是“反党集团”，后又

定为“反革命集团”。毛泽东在舒芜提供的材料的基础上，又得出了“他们的人很不少”，他们不是“单纯的文化人”，“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斯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解放后是发展了，如果不加制止，还会发展下去”的结论。从这样的判断出发，在全国开展了“肃反运动”，首当其冲的是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界，同时也清洗了大批敌伪留用人员、起义和解放军官，以及党内的一些同志。

实际上，在这之前的三次思想批判运动（对《武训传》、红学研究和胡适思想的批判），“左”的思想已经显露锋芒，在知识分子中已经引起不安。但是，这四次批判（加上对胡风等的批判），从总体上讲还不是全国性的，真正的全国性的运动是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开始的。“反右派”源自当年春天党内的整风运动。在运动中，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对党的工作和作风提出了大量尖锐而又中肯的批评，也有极少数人发表了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对这极少数人的个别言论，作了极端扩大化的估计，因而决定由整风转为“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运动结束后，给55万人戴上了属于“敌我矛盾”的“右派分子”帽子，（其中错划的占97%以上），有的开除公职，有的监督劳动，有的返乡务农；另有更多的人被定为“中右”，他们的工作、待遇等也普遍受到歧视性安排。同这些人相联系，他们的家属、亲友也受牵连。这三种人的总数，不下1000万人。这种“反右扩大化”是相当“扩大”的。

在“反右派斗争”之后不久，在1958年的各种“大跃进”中，又为了反对“保守”和“落后”，开展了“插红旗、拔白旗”的活动，许多基层干部因此而被批判、降职、撤职。

1959年揪出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以后，又在全党自上而

下地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有300多万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一次不但人数比1957年的“右派”多得多，性质判断完全错误，而且标志着“阶级斗争”的矛头由以党外为主转向以党内为主。

1960年到1962年的经济大滑坡，人民的大饥荒、大死亡，迫使人们不得不暂缓党内的“阶级斗争”。但是，到了1962年，经济刚刚有了一点恢复，人民刚刚松了一口气，就又“重提阶级斗争”，并且定为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抓就灵”的基本路线。斗争又开始了。一方面在城市逐步展开对“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斐多菲俱乐部”“城市老爷部”等的“批判”，另一方面又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搞“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最终导致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人民推入空前的浩劫中。一批批的人被杀害，被迫自杀，被折磨致残，被戴上“牛鬼蛇神”、“反革命”、“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权威”、“土匪”、“军阀”、“内奸”、“工贼”、“小爬虫”、“变色龙”、“黑五类”、“臭老九”等帽子。

我国经济和人口问题的严峻形势，反复不断的“运动”浪潮，日益引起人们的深沉忧虑和思考。

这种思考最终集中到我们长期奉行的理论、路线和体制上来。

人们思考了些什么呢？从经济的角度看，我国经济的滑坡同我国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强化是同步的。“三大改造”在1956年基本完成。这种完成，为政府向工农商各业发号施令作好了准备，因为从理论、实践和法律的角度讲，政府无权也无力对独立经营的私人企业、对分散经营的个体农民、个体商贩和个体手工业者发号施令（只要它们不违法），而“改造”一旦完成，它们就一变为政府“自己的”或“服从政府的”，政府的一